本版编辑：李步前 版式设计：张 慧 E-mail:f4@studytimes.cn Tel:010-68922368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领导的黄河治理

□ 王乃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治国史。千百年以来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在炮火硝烟中起步，自此至1955年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事业从0到1的初创时期，是黄河由乱转治、变害为利的关键阶段。

“黄河归故”催生人民治黄机构建立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黄河水阻挡日军西进，导致黄河水冲出故道，形成横跨豫皖苏三省44县的千里黄泛区，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溺亡，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黄河改道南流后，故道沿岸群众在河床里开辟耕地，建设家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故道两岸建立了冀鲁豫和渤海两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决定封堵决堤口门让黄河回归故道，表面为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实际企图再次“以水代兵”分割黄河下游解放区。当时黄河下游故道大堤已废弃8年，又经战争损毁残破不堪，若仓促让黄河回归故道，下游解放区将成为第二个黄泛区。

中共中央统筹全局，下达指示：“黄河归故，对华北、华中利弊各异，但归故意见在全国占优势，我们无法反对。此事关系我解放区极大。我们拟提出参加水利委员会、黄委会、治河工程局，以便了解真相，积极参加工作，保护人民利益！”中共中央以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主张先在下游完成复堤、浚河及迁移河床居民等工作后再堵口，防范下游水灾。

就在中共中央进行酝酿协调、确定关于“黄河归故”立场之时，国民党当局却置共产党的合理主张于不顾，决定不进行复堤而先办理堵口。中共中央在揭露并反对蒋介石水淹解放区阴谋，与国民党谈判斗争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必须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治黄机构开展复堤斗争。为此，中共中央着眼长远谋篇布局人民治黄事业，于1946年2月在冀鲁豫解放区成立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5月底改称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1949年6月，华北、中原、华东三个解放区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1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改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

“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反蒋治黄

人民治黄机构成立伊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带领解放区人民投身浩浩荡荡的复堤斗争。1946年5月至6月，渤海、冀鲁豫解放区分别组织数十万群众开展复堤工程，然而国民政府屡次撕毁协议，于6月单方面在花园口实施堵口工程，同时破坏河防设施，并对复堤军民进行炮击扫射。据黄河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沿河居民日夜抢险复堤，遭蒋军炮击扫射死者达430人，伤者156人。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合龙竣工，黄河回归故道。冀鲁豫、渤海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抢时间、争速度，赶在1947年7月汛期前修复了下游大堤，最大限度减少“黄河归故”后洪水对故道两岸的冲击。

黄河回归故道后，人民治黄机构带领解放区军民开展修堤整险、防汛救灾、拥军支前等工作。1947年，支援刘邓大军过黄河成为当时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项神圣使命。黄河河防指挥部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建造、管理船只，保障战时水上运输通行。同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彻底宣告蒋介石的“黄河战略”破产。大军渡河后，刘邓首长对黄河各渡口员工进行了嘉奖，称赞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国民政府无力根治黄河，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利益与人民主体地位存在根本冲突。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实现了人民利益与主体地位统一，激发了人民创造热情和主人翁精神。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前夕，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方针，点燃解放区人民“反蒋治黄”热情，数十万民工参与堤防施工。解放区发起献砖献石运动筹备治黄石料，冀鲁豫解放区人民踊跃捐献，复堤工程不到三个月完工。《一九四七年黄河安澜大会记录》指出，此次治黄胜利源于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团结。

开辟不再决口、悬河兴利新纪元

从1919年黄河有实测水文资料起，到1938年花园口决口的20年间，黄河有14次决口泛滥。其中1938年至1947年9年间有6年决口漫溢59处。1947年至1949年汛期，党领导人民接手黄河下游河务后凭借坚定的信念支撑、顽强的战斗意志，克服物质匮乏等困难，均取得历史性胜利，没有发生一次决口成灾，自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状况，开启了岁岁安澜的奇迹。特别是1949年汛期，黄河连续出现洪峰，发生了“黄河归故”后的首次大洪水，花园口水文站洪峰流量达到12300立方米/秒，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党政军迅速动员起来，组成了40万军民的抗洪抢险大军，夜以继日战斗在堤防线上，终于战胜了这次洪水，向新中国献上了一份礼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计委批准在下游地区建设滞洪工程，开辟分滞洪区，以防御异常洪水。经过长期实践完善，这项举措后来成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黄河下游首次进行大规模堤防维修。经过施工，堤防的防洪能力得到逐年提高，1950年至1957年8年间，共完成土方14090万立方米。1952年，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创了黄河下游大堤建闸引黄灌溉的先河，开辟了千百年来黄河下游引水兴利的新纪元。1952年10月，毛泽东首次视察黄河，亲自确定了沿黄河下游而上的考察路线，选择了历史上受过黄河水灾的地区。视察期间，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在此后的1953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三次在郑州听取治理黄河的汇报，并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治理黄河的情况，极大推动人民治黄事业沿着兴利除害的方向稳步推进，一批防洪、灌溉工程陆续落地建设，黄河治理逐步从单纯应对水患向统筹治患与兴利转变。

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整为流域性机构，打破分省治理局限，统筹调配全流域人力物力共同治河。党领导人民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和毛泽东重视治理水患，在经济困难时坚持集中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尤其重视黄河治理，实现由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的初步转变。不断完善黄河防汛指挥体系和管理机制，确立“专业抢险队伍和人民群众防汛队伍相结合、实行军民联防”的基本防汛体制，使治黄事业从少数人工作变为千万群众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为此后形成完善的防汛工作机制奠定基础。

实现从分散治理到统筹谋划的深刻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治黄事业逐步探索推进，党领导人民不断深化对治黄规律的认识，立足全流域生态保护、水患防控、水资源合理配置等治理目标，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治理，逐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的治黄工作体系，推动黄河治理从被动应对水患的分散模式，迈入全流域协同、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新阶段，为黄河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索从分区到流域统筹的跨越。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把脉全河，才能定向全局。1950年至1954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先后组织32个查勘队，对黄河流域开展全面查勘，为确定黄河综合治理开发目标提供了可靠依据。1952年上半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拟定了1953年启动的黄河10年治理开发轮廓规划，1954年10月底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这项综合规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黄河综合规划，标志着人民治理黄河事业从此迈入全面、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探索从治标到标本兼治的深化。水沙关系是治黄的关键。随着全流域综合规划落地实施，黄河治理思路逐步向下游防洪与中游泥沙治理协同发力的方向调整。195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通过专题报告提出治河目的应是变害河为利河，总方针为“蓄水拦沙”，即把泥沙拦截在西北的千沟万壑与广袤土地中。国务院认可该报告，认为“这是黄河治标的办法”“又属于治本计划之一部分”。与此同时，“蓄水拦沙”工程的兴建地点确定在三门峡河段。三门峡工程自1960年9月建成投用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其所涉及的黄河治理开发一系列重大问题，早已超出工程本身范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整个黄河乃至中外多泥沙河流客观规律的认识。

探索从治理开发到保护修复的拓展。在治黄实践中，黄河治理理念逐步从侧重工程修筑、灾害防控、资源开发，向生态保护与自然修复并重转变。1950年起，国家先后扩建、新建天水、绥德、西峰等水土保持试验站，开展科学实验与推广。1953年，水利部会同农业部、林业部、中科院等组成考察团，对黄土高原全面勘察，研究水土保持措施与治理方向。1954年开始制定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在下游堤防建设、河道整治中，也逐步注重河滨生态、滩区环境保护。这一跨越跳出了单纯“与水争地、向河要利”的思维局限，开始统筹考虑水资源涵养、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沙调控的关系。这不仅是保护治理黄河手段的丰富，更是对黄河价值认知的升华。

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在发轫阶段，在面临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挑战下，坚守根本立场的人民性、时刻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性、秉持“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的斗争性、坚持流域统一管理的系统性，迅速转危为安、除害兴利、框架初定、稳步发展，彰显了党的把舵领航作用，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启示。

学史明理

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 两河口会议：会合

□ 杨代云

两河口位于懋功县的北部，是懋功通往马尔康的必经要道。它因梦笔河和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更以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确定战略方针而载入史册。两河口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正确战略，从政治层面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的路线，维护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明确了全军统一指挥的原则，为红军挺进西北、投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胜利会师，全体指战员万众欢腾、士气高昂。懋功街头响起《两大主力会合歌》：“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6月15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与你们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复电：“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

然而，两军会师之后，红军内部关于后续发展战略产生了明显分歧，究竟是北上开辟新区，还是南下、西向退守偏远区域，事关红军的前途命运。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同时分析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高山深谷、贫瘠人少，不具备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条件。次日，张国焘等复电，不愿意向北发展。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再次复电，阐明：“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6月20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研判“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请其“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显然，红军战略方向悬而未决，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敲定行动方案，已迫在眉睫。

根据6月20日朱德致一、三、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和朱德致徐向前、陈昌浩的两封电报内容，中央政治局原计划“于二十二号在两河口开会，决定战略”。但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已是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因此延至6月26日召开。

“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

彼时红军处境极为艰难，后勤补给陷入严重困境。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不得不紧急向各军团及军委纵队下发指令，规定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调整伙食标准，“每天改为两餐，一稀一干”。

6月23日，张闻天抵达两河口。为了统一认识，把这次会开好，他于6月24日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阐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明确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批评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错误主张。该文是长征中系统阐述中央北上方针和明确批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最早文献之一，红一军团政治部于6月25日以单行本印刷发行。

6月25日，张国焘来到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走出驻地远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大雨中举行，毛泽东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气氛热烈欢欣。朱德在会上致词：“两大主力的会合，欢呼欢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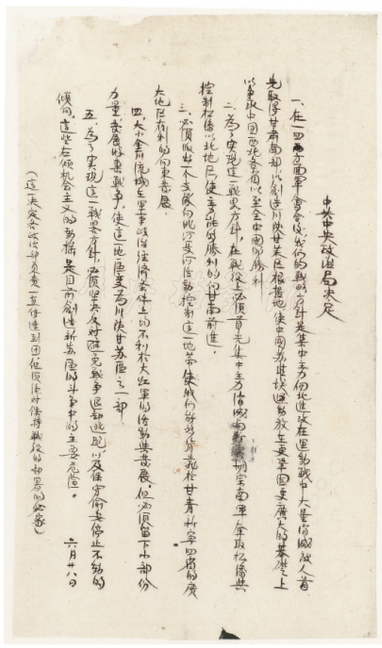
来到两河口的张国焘，仍固执己见，不同意北上。他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周恩来告以约三万人。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对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并说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朱德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提醒他，蒋介石虽然派十万人来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红四方面军可以先机占领松潘，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以敌人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为由，一口拒绝。

“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一座关帝庙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与会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要求把部队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周恩来作报告之后，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1935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档案馆藏）

其他发言者也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朱德指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增加了很大的力量。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要迅速北上，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张国焘虽然强调困难，但他口头上还是表示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强调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放弃这一方针是错误的。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赞同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苏区，并委托张闻天写一个决定。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两河口会议记录的结尾部分，记载着此次会议的决议事项：“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洛甫）。”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发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中革军委随即制定松潘战役计划，调配兵力攻取松潘。

上述决定明确给出警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尽管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对党中央的决定投了赞成票，其内心仍不同意红军北上。也正因为他的拖延、避战和分裂活动，致使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队、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否则，两河口会议创建川陕甘苏区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档案中的党史